

我国当前外语教育改革要议^{*}

鲁子问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0083)

[摘 要] 外语教育改革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热点和政策热点,但合理的外语教育改革需要更加冷静的思考和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外语教育改革,应该建立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外语教育体制,开展社会与个人需求调查和社会与个人价值研究,明确外语教育目标 and 价值,完善可选择的外语教育体制,建构政府与市场责任明确并促进社会发展与个人幸福的外语教育。

[关键词] 外语教育;政府与市场责任;社会发展;个人幸福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4)01-0008-07

自我国 1964 年发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以来,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我国仍无新的国家层面的外语教育规划或者总体方案。当前外语教育改革社会呼声正高,各种外语教育与考试新政不断出台,外语教育与考试改革成为社会热点,外语教育之外的各种力量倒逼外语教育改革的态势已经形成,形成外语教育改革总体方案似已成举国之盼。改革不能一味迎合以感性议论、而非理性分析为主的网络舆论,不能进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随机、无序改革,而应该理性、有序地开展综合改革。笔者特就我国当前外语教育改革略述些许拙见,以为我国当前外语教育改革献个人绵薄之力。

一、明确我国外语教育性质,分清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责任

我国当前外语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已成共识,如何改革则众说纷纭。外语教育改革涉及国家、学校、社会、家庭、个人等多个层面,显然急需形成外语教育综合改革的方案。在各种利益交织的当前时期,要形成综合复杂的外语教育改革方案,必须首先厘清外语教育的性质,因为只有在明确外语教育的性质之后,我们才可准确分析外语教育

改革措施的可能与不可能。

我国当前外语教育具有多种形式:一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外语教育。这类外语教育主要是公办教育机构学历教育中的外语教育,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各个阶段的公办学校外语教育,其性质显然属于基本公共服务。^[1]二是民办教育机构提供的学历教育中的外语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民办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阶段的民办教育,民办学历教育的外语课程标准或教学要求、课程设置,在本质上与公办学校相同,其教育性质更完全相同于公办学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属于不可盈利的非竞争服务,故而亦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三是公办与民办教育机构提供的非全日制教育中的社会培训外语教育。由于其盈利特性,这类外语教育显然属于竞争性公共产品,其性质不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但由于同样明显存在非排他性,而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特性,故而应属于准公共服务。由此可知,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其性质总体上属于公共服务,其中大部分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一部分属于准公共服务。

作为公共服务的外语教育,必须承担公共服务的功能。基于其公共服务属性,我国外语教育

* [收稿日期]2013-12-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化城市的外语规划——上海与纽约、东京的比较研究”(13BYY05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10JZD0043)。

[作者简介]鲁子问(1963—),男,湖北秭归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考试制度、外语政策。

首先必须服务于社会,满足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必须服务于公民,满足公民个人为了个人幸福而学习外语的需求。同时,教育不只是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求,还要实现教育之于社会 and 个人的价值,政府之所以开展面向全体国民的外语教育,是因为外语教育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外语教育的性质应为:通过满足社会外语人才需求与公民个人外语学习需求,同时实现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幸福的公共服务。^[2]

既知外语教育为公共服务,则外语教育改革应厘清外语教育的政府责任与市场责任,确立政府与市场两个改革路向。

我国目前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外语教育体制满足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外语人才需求。众所周知,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外语教育,但我国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外语人才需求至今尚没有得到有效满足,这既是政府提供的外语教育本身存在的不足所致,更是单纯依靠政府提供的外语教育满足全社会外语人才需求的制度设计缺陷所致。事实上,把外语教育的全部责任都归于政府是不科学的,政府承担一切外语教育也不现实,必须确定政府与市场的明确分工,建立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协调机制,方才可能较好地满足全社会的外语人才需求。比如,趋势性调查数据肯定只是预测性数据,必然会出现社会对外语人才需求的变化,适应这种变化,市场比政府更为有力。同时,企业对于外语人才的需求,可通过全球人力资源市场进行平衡,尤其是外语人才可以从该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或地区获得,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解决。如联想集团需要一批“既懂英语,又懂斯洛伐克语、法语、德语等欧洲语言的技术人员”时,联想集团采取了从斯洛伐克等国家直接获得相关人才的办法。^[3]由此可知,市场亦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或者说,满足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亦应依靠市场的外语教育,而不只是单纯依靠政府的外语教育。从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而言,市场提供的外语教育则因为其逐利性

而不可能承担价值教育的责任,这只能是政府提供的外语教育的责任。

显然,实现有效的外语教育,必须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外语教育的不同责任入手。不厘清政府与市场对于外语教育的不同作用,无法制定真正长期有效的外语教育改革方案。试图单纯通过政府措施改革整个外语教育的努力,可能在短时间获得成功,却无法真正成功,无法真正建构有效的外语教育机制,由国家强制性进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以对大学英语教育进行改革的历史,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所以,要进行有效的外语教育改革,就应确立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责任、不同功能,设计政府与市场相协调的改革措施和路径。

如前所述,外语教育作为公共服务,具有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两种形式,我国当前外语教育也具有政府的外语教育和市场的外语教育两种基本形式。但是,现在我国的外语教育的责任主要由政府承担,在功能上,市场的外语教育只是起到辅助应试的作用,而没有起到培养社会所需外语人才的作用,这是因为我国目前的外语教育没有明确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责任,没有明确政府与市场在外语教育领域的协调作用。在外语教育满足社会对于外语人才的需求、满足个人的外语学习需求层面,政府与市场都具有责任,改革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责任和相互协同作用。从政府与市场对于人才市场的分工可知,政府提供的外语教育必须满足市场不可进入的国家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外语人才需求,而对于市场可进入的各个领域的外语人才需求,则应该主要依赖市场提供的外语教育。从政府的外语教育的体制性大于变化性、市场的外语教育变化性大于体制性而言,对国家政治、安全、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外语人才的需求,主要应通过政府供给得到满足,并在一定程度上、一些层面上由市场供给;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外语人才需求,则主要应通过市场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一些层面上适当依靠政府供给。而在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人文价值层面,由于市场的外语教育的逐利本性,显然无法起到真正有效的作用,而只能由政府承担这一责任。

从政府的外语教育供给而言,当前外语教育

的国家层面的需求极为迫切,尤其是高水平外语人才需求、小语种外语人才需求,要求进行系统的外语规划,包括外语政策的宏观、中观、微观规划,人才培养方式规划等等。

从市场的外语教育供给而言,当前外语教育需要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合理分权,因为外语教育已经存在大量的非国家可完全控制的个人选择,国家必须按照政府与市场所具有的不同资源,适度与社会、个人进行合理分权,让外语教育的政府供给部分按照政府价值取向开展,让外语教育的市场供给部分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

我国当前外语教育改革,首要之务在于设计政府的外语教育和市场的外语教育双路径,政府的外语教育由政府主导进行改革,市场的外语教育则由市场规律主导其发展,国家可以以政策形式对市场外语教育进行合理干预调控。

政府的外语教育应该以培养市场不得介入的外语人才为主,以实现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为主,应该是免费的、绩效评估体系明确的。市场的外语教育应该以培养政府不必介入的外语人才为主,应该是自费的、自我确定学校目标的。政府与市场的责任需要分工,更需要协调。如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等领域的外语人才在涉密层次的培养,不可由市场进行培养,但在涉密层次之前的培养,则可由市场进行培养。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的小语种外语人才的培养,则显然需要以政府主导的外语教育体系为主进行培养。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关涉国家的价值体系构建,当然需要政府主导的外语教育进行培养,尤其是在价值观培养较为重要的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应主要由政府主导,应改变目前的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以外语运用能力为主的目标定位,而定位于符合国家价值目标建构体系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目标为主,以外语运用能力为辅。

二、开展调查与研究,明确外语教育目标

明确我国外语教育性质,即可明确我国外语教育的总体目标,继而,则可在总体目标下明确我国外语教育的具体目标。

如前所述,我国外语教育需要既满足社会的外语人才需求和个人外语学习需求,同时又实现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显然,我国外语教育应需要明确社会层面的外语教育目标,也需要明确个人层面的外语教育目标。

(一)明确外语教育社会目标,满足社会对外语人才需求,实现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

从我国目前发展阶段看,改革开放是我国当前的基本国策,外向型经济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显然,国家总体外语能力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能力,当前社会发展需要我国有足够数量、不同语种、不同外语水平的外语人才,包括外语专业人才和具有外语运用能力的专业人才。由此可知,形成我国当前外语教育综合改革的方案,需明确我国社会发展对于国家外语人才总量的需求,对于不同语种、不同外语能力层次的外语人才需求,尤其是对于外语专业人才、运用外语的专业人才的需求。

基于已知数据和笔者的调查,笔者认为,我国社会发展对于外语人才需求领域较为明确,但需求数量却尚待明确。

首先,我国的全球领导力发展需要我国一批精通外语的领导人才参与国际事务。根据中央电视台 2013 年 11 月 6 日报道,“截止到今年 6 月 30 日,供职联合国秘书处非语言类(不是翻译)的中国籍专业人员是 74 名,低于联合国开列的认为是 116 到 157 人这样一个恰当幅度,被认为是任职人数偏低的国家,而且在这其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国籍职员是 11 人,低于美国 48 人,法国 18 人,日本 14 人,英国 19 人,德国 17 人。”^①显然,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全球领导力的快速发展对高层次外语人才有着更大的需求。

其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批精通外语的专业人才、能运用外语进行外语服务与相关工作的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的员工。根据《2011 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实情书》可知,“英语技能与人均出口产值呈正相关。提升英语掌握程度被视为出

① 此组数据来自中央电视台 2013 年 11 月 6 日《新闻 1+1》专题节目。

口强国的必要前提。”根据《经济学人》智库2012年的调查,七成企业高管表示,企业如若扩展,职工必须掌握英语。另外,四分之一的高级管理人员认为,需要半数职工掌握英语。尤其在经济外包浪潮中,除劳动力成本之外,首要考虑因素是外包承接国劳动力的学历与英语技能。^①我国的经济发展迄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实施以国际贸易促进国内发展的经济政策,我国也是主要的外包承接国,这使得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外语人才。基于笔者对我国国民外语能力需求的调查,受访者中,在工作中需要使用外语的占18.8%,29.0%的受访者因工作需要而重新学习外语,23.7%因工作需要学习日语,23.5%因工作需要学习法语,19.8%因工作需要学习韩语。笔者访谈得知,联想集团每年需要花费大量经费用于员工外语培训,员工的外语能力远远不能满足联想国际发展的需求。^②

最后,我国目前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军事与安全形势,我国“走出去”的文化战略,也需要大批精通外语的军事、安全、文化专业人才。此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无需赘述。

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还必须实现教育的社会价值。

外语教育不仅仅应该满足社会发展的外语人才需求,还必须实现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对于当今中国,外语教育具有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态度的社会价值,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在1840年以前的中国,外语教育只是面向极少数人的教育,因为国家对外交往甚少,对外开放程度有限,基本处于闭关自守的形态,社会不仅没有对外开放的态度,反而以闭关自守抗拒对外开放。随着中国逐步对外开放,外语教育逐渐发展。随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心态,这使得外语教育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有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过于重视,但是,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心态却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在网

络上屡见不鲜,石击外国大使馆的过激国际交往行为还是时有发生。显然,我国亟待进一步强调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以建构更加合理的对外开放社会心态,为我国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国际环境。

以此可知,我国外语教育应培养我国社会发展所需的外语人才,同时应该实现外语教育之于我国的社会价值。

虽然以上分析说明,国家外语能力总量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生产要素。不过,笔者调查也发现,有81.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工作中不需要使用外语。由此可知,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并非需要全体公民成为外语人才。显然,若形成全国性的外语教育改革方案,则尚需对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需求开展进一步调查,以使之明确,包括现实需求调查和趋势性需求调查,以及语种、外语运用能力需求调查。

同时,虽然外语教育的促进对外开放的社会心态建构这一社会功能众所周知,但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当前全社会对外开放心态达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建构,则需要科学的研究分析。

由此可知,从满足社会需求而言,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改革,必须从开展全面的外语人才需求调查开始,然后基于科学的调查,编制国家外语人才总量规划、外语教育语种规划、外语能力层次规划等,尤其是外语专业人才、精通外语的专业人才、外语服务与工作人员等的需求总量与能力层次规划,之后基于规划制定各层次相关外语教育改革方案,包括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改革方案、高等教育外语教育改革方案等等,通过政府提供的外语教育,满足国家对于市场不得介入领域的外语人才的需求,同时进一步完善外语教育的市场机制,通过更加符合市场机制的市场供给,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责任,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外语人才;从实现外语教育的社会功能而言,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改革则需要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外语教

① 此组数据来自《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15日(07)《英语教育去哪儿》。

② 文中笔者调查数据均来自:鲁子问、张荣干. 中国外语能力需求调查与战略建议[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不再一一说明。

育的社会价值,使之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不至于危及我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然后进一步强化政府提供的外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促进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的实现。

(二)明确外语教育个人目标,促进个人幸福,实现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价值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通过外语学习丰富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个人幸福。

我国每年都有大批公民出国学习、旅游。自 1978 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经超过 300 万人,2013 年突破 40 万人。^① 仅 2013 年一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预计达到 9430 万人次。^② 外语能力显然是出国学习的基础,对于出国旅游的游客,若具有一定外语能力,也有助于其享受国际旅行生活。

外语已经进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公民的生活形态,外语生活已经成为一部分国民的生活常态。笔者的调查发现,受访者运用外语平均频率最高的前 3 件事情是:看外语原版电影、电视剧等,学唱、演唱外语歌曲,看外语电视新闻与电视节目。显然,外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我国公民的日常生活。若从绝对意义而言,随着 CCTV 在每天电视屏幕的出现,O 型血、“拜拜”等英语元素进入百姓生活,外语已经进入了我国全体公民的日常生活。

同时,外语运用能力对于提高个人收入有着显著作用。调查发现,全球企业人事部门和人事代理机构负责人认为,英语技能达到本地平均水平以上的劳动力,其收入比拥有同等学历的劳动力高 30% 到 50%。^③ 显然,我国公民为了个人收入而学习外语的需求依然存在。

我们也知道,中小学阶段的外语学习可以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尤其是语感基础,在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中需要外语时,这些基础

有助于其继续学习外语,同时,外语学习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心智发展。^[4]

而且,我国有一部分老年人纯粹因为个人兴趣而选择在老年大学学习外语。^[5] 另外,据科学研究,外语学习可能有助于预防老年神经功能退化,^[6] 从而可能有助于人免于某些疾苦而促进其个人生活幸福。

当然,我国仍然是一个正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国家,外语不是实现个人幸福生活的必需品,外语学习也没能促进每一位公民的个人幸福。笔者调查发现,71% 的受访者表示在工作和生活中不需要重新学习外语。据《新京报》的一项调查可知,有将近一半(44.7%)的受访者表示在中学时期不太喜欢(32.0%)或非常不喜欢(12.7%)英语学习。^[7]

由此可知,我国公民的外语学习需求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有一定比例的公民具有显著的外语学习的个人需求,外语为他们带来出国学习机会、收入增加可能、事业发展机遇;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公民没有外语学习的个人需求,外语学习甚至给他们带来了某些痛苦。

以上讨论的是公民个人对于外语学习的工具性需求。而我们知道,外语教育不应只是满足个人对于外语的工具性需求,更需要实现外语教育之于个人的人文性价值,因为外语教育对于个人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更具有人文性价值。

外语学习有助于个人对外在文化的跨文化理解,^[8] 这使得外语学习对于公民个人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人文性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只使用母语进行跨文化教育,促进心智发展,但目前尚不能确定,运用母语进行跨文化教育、起到同样的心智发展作用的成本,是否小于外语教育起到相同作用的成本。我们必须承认,任何语言都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因为语言本身即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正如母语学习具有其不可替代

① 1978—2012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 264.47 万,2013 年预计将突破 45 万。数据来自“中国教育在线 2013 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http://www.eol.cn/html/lx/baogao2013/page1.shtml/2013-11-15>.

② 此为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预测数据。<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4-24/4761981.shtml/2013-11-15>.

③ 此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报》2013—11 月 15 日(07)《英语教育去哪儿》。

的人文性价值一样,外语学习(任何外语的学习)也同样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人文性价值。为此,在没有弄清楚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价值是否能够完全为母语教育所实现之前,有必要为了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价值而继续开展面向全民的外语教育,且不论公民个人是否喜欢外语学习。就如有一部分公民不喜欢语文教育,而我们不能因此放弃全民语文教育一样,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分公民不喜欢外语学习,而放弃全民外语教育。众所周知,世界文化中的一些要素对于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面向全民开展有引导的外语人文价值的教育,有助于中华文化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实现中华文化的发展。

分析以上因素可知,从促进我国公民个人幸福而言,外语教育改革应满足公民为了个人幸福而学习外语的工具性的不同需求,更应特别明确面向全民的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价值,引导公民形成基于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价值学习外语的需求,从而实现外语教育对个人幸福的促进作用。然而,外语的人文价值如何面向全体公民进行教育,教育到什么程度,则需从国家的价值建构层面决策,而非外语语言本体、外语学习的价值、外语教育规划、外语教育改革方案所可探求的问题。

鉴于公民对于外语教育的工具性需求具有较多差异,相当一部分公民可能不了解外语教育的人文性功能,对于当前外语教育改革的个人目标,通过调查分析,明确面向全民的外语教育的工具性需求,并需要通过学术研究,明确面向全民的外语教育的人文性内涵、目标、要求,以此编制外语教育改革方案相关内容,通过政府与市场更为合理的分工,满足公民促进个人幸福的外语学习的工具性需求,同时,通过政府的外语教育,开展促进公民个人人文性素养的外语教育。

三、完善有选择的外语教育体制

如前所述,我国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有着显著需求,但并非要求全体公民都成为外语人才;我国公民对外语的需求也有着显著的多样性,外语运用能力并非每一个公民实现个人幸福的必需品,而外语教育对我国全体公民具有不可替代的非工具性价值。

我们知道,由于人类自身的认知局限和现有技术辅助人类认知分析与决策的有限性,人类尚不能无遗漏地获取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公共服务需要根据已知信息在若干可能选项中做出选择,研究公共服务效率的诸多著名学者均倡导为公众提供可选择的公共服务,如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布坎南、森、奥斯特罗姆等。

在我国社会发展和个人幸福已经逐步脱离全能主义桎梏的当前发展阶段,我们当前的外语教育体制总体上是有选择的外语教育体制,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大学英语教学要求》都为英语学习提供了一定的选择性目标。但是,在诸多外语教育环节,尤其是课程实施、学业评价、招生考试等环节,依然采取全能主义模式,这恰恰是导致现行的有选择的外语教育体制无法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

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改革方案应进一步完善目前的可选择的外语教育体制,尤其是课程实施、考试评价等环节的选择性,使之成为以选择性为主、规定性为辅、具有更为充分的选择性的外语教育体制。具体建议为:

1. 我国应该建立外语教育的基准要求。基于我国社会发展并不需要全体国民都成为外语人才,外语运用能力也非我国全体公民个人幸福的必需品,但外语教育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国应要求所有中小學生必须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习一定学时的外语,达到一定的外语水平,但应设置更加合理的外语工具性与人文性要求,降低工具性目标,提升人文性目标,进一步强化通过外语教育发展全社会的对外开放心态,促进个人综合人文素养提高。学生可以选择开始学习外语的起始年级或学段,但在基础教育阶段必须完成规定学时的外语学习,或者达到规定的基准要求,尤其是其非工具性要求。

2. 国家和社会、企业应该以外语优秀人才奖学金、小语种奖学金等制度,鼓励公民在基础教育阶段或者高等教育阶段基本掌握一门外语。现实证明,我国相当一部分高中毕业生在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时可以基本达到掌握一门外语。我国近些年每年数十万的出国留学人员中,绝大多数是高

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他们中大部分已经基本掌握所学外语,具有进入国外大学学习的外语水平。

3. 国家应鼓励公民、尤其是在职人员,通过社会教育发展外语能力。国家可以采取减免所得税、抵扣所得税等方式,社会应通过志愿者服务等形式,鼓励公民发展外语能力,为培养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具有外语能力的专业人才。

4. 国家应该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社会应通过志愿服务置换等形式,满足公民、尤其是老年公民非语言运用能力指向的外语学习需求。

5. 国家应该建立政府与企业合理分工的、有层次的、基于能力评价的外语能力评价体系。

[参 考 文 献]

[1] 陈振明. 公共服务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World Happiness Report [R]. Paris: UNESCO, 2013.

[3] 鲁子问,张荣干. 中国外语能力需求调查与战略建议[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程晓堂,岳颖. 语言作为心智发展的工具——兼论外语学习的意义[J]. 中国外语, 2011, (8)

[5] 老年大学英语课好多老人感兴趣[EB/OL]. <http://roll.sohu.com/20110519/n308032075.shtml>/2013-11-15.

[6] Ellen Bialystok, Fergus I. M. Craik, Raymond Klein, and Mythili Viswanathan. Bilingualism, Aging, and Cognitive Control: Evidence from the Simon Task [J]. Psychology and Aging, 2004, (2).

[7] 超七成受访者支持高考英语降分值[N]. 新京报, 2013-10-26.

[8] 鲁子问. 中小学英语跨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

Reform Focuses of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LU Zi-we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a social and policy-making focus requires much thinking and incisive analysis. This paper regards the following as the focuses of the reform of the of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rational market division with the government support, an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and personal demands and values, clear government and market responsibilities, and a clear targe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or realizing personal happiness.

Key words: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responsibilities; social development; personal happiness

[责任编辑:杨 恬]